

抗日战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形成

吴向伟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 而且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哲学基础、根本原则、基本途径和方法,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这一理论的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 是有着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认识更加深刻、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抗日战争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丰富的斗争实践等时代和社会历史背景的。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3-0324-05

毛泽东在1956年曾指出,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才“真正找到了把马列主义真理和中国情况相结合的道路”^{[1](133)}。这句话深刻阐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 有力地指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伟大胜利, 而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 为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

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著作, 不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 而且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哲学基础、根本原则、基本途径和方法,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根据毛泽东的阐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 要“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2](797)}。不能机械地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和外国经验, 而应“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 具体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797)}。

第二, 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3](534)}。即要在理论形态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无论是在语言还是在思维方式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都具有鲜明的西方特点。马克思主义要中国的革命斗争中发挥巨大的威力, “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534)}。所谓“一定的民族形式”, 即是说, 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 同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相结合, 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第三, 要“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4](408)}。时代、实践和科学是不断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停留在的现成结论上, 而应不断总结实践经验, “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 产生新的理论”^{[4](381)}, “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374)}。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和主要标志。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

为什么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7年7月和8月, 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论文, 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为什么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实践论》围绕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全面阐述和发挥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 论证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毛泽东着重指出: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基本的观点。”^{[5](284)}这里,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实践第一”的科学命题, 树立的是实践的权威。既然认识是依赖于实践的, 而中国的革命

的实际又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并在急剧变化，那么，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打破各种条条框框，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矛盾论》着重从各个方面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强调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就必须对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说：“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5](317)}“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5](311)}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拒绝对具体事物进行分析，不了解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时，不去分析研究中国国情的特点，只会生搬硬套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因此，共产党人搞革命，一定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跨越到建构哲学理论体系，为他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提供了世界观、方法论的正确指导。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

1939年10月，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深刻总结和反思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第一次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的公式，并把是否善于“相结合”，看作是党成熟与否的一个主要标志和尺度。从此，这一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遵循的根本准则。

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533)}这就阐明了坚持“相结合”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

首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革命导师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2](815)}。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为了单纯地学

理论而去学习理论，而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2](799)}。

其次，要研究中国的实际。在毛泽东看来，“实际”就是“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的一切”。它有三个层次的含义：其一，是指中国的基本国情，包括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633)}其二，主要指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及其经验。正确的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6](320)}，是对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其三，是指中国的历史文化。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3](534)}只有对这些“实际”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第三，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即教条主义的态度和经验主义的态度。“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2](1094)}虽然这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思想方法的本质是一致的，即都“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2](819)}，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为其基本特征的。这种主观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内产生“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2](800)}

第四，还需要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2](820)}。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2](820)}。在毛泽东看来，作出新的“理论性创造”，是“相结合”或“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毛泽东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4](373-374)}。因为“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中国的问题,创造出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着了。”^{[4](408)}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毛泽东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验的基础上,阐明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这就是被人们概括的三个著名公式:其一,“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矛盾辩证运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和实践向理论的转化,从而推动理论和实践向前发展。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5](296-297)}其二,“特殊—一般—特殊”的公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又是一般和特殊的辩证矛盾运动的过程。毛泽东认为,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才有可能更进一步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然后,人们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从而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5](310)}其三,“群众—领导—群众”的公式。人民群众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主体。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人民群众的有机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化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的统一起来。这就要求在实践中实现相信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领导的有机统一。为此,毛泽东提出了“群众—领导—群众”的公式:“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2](899)}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一,调查研究的方法。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是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他向全党提出了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任务,并强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他不仅经常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且还阐述了作好调查研究应有的态度和方法,即既要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和尊重事实科学态度,又要运用普遍调查、典型调查、会议调查、蹲点和试点等方法。第二,矛盾分析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在分析矛盾时既要分析其普遍性,又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在处理各种矛盾的关系时,首先要抓住重点,即抓住主要矛盾,并把它作为解决其它矛盾的根本点和出发点。第三,“古今中外法”。毛泽东说:“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励,是及其巨大的。”^{[5](303)}因此,要认清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研究“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3](303)}。1942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古今中外法”,他说:“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4](400)}

二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7](54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立于抗日战争时期,是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的。

(一) 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认识更加深刻

由于党的理论准备不足,抗战前理论研究与实践斗争的某些脱离现象的普遍性,使中国革命遭受挫折。鉴于此,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向全党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3](533)}的任务,并利用当时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大本营环境较为安宁的有利条件,在全党掀起了阅读马列著作的热潮。毛泽东

和全党高级干部在联系中国实际大量研读马列著作中，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而单单引证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现成公式或照搬别国经验，也会把革命引向歧途。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

（二）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

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应用中国实际，到农村中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建设根据地，使中国革命得以复兴和发展。但这一时期，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特别是由于1931年开始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只知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因此，克服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实践中正确应用马克思主义，是党必须解决的课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都是为了克服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写的，是对建党多年来如何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正反两方面充分经验所进行的理论概括。

（三）抗日战争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丰富的斗争实践，为党和毛泽东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提供了现实土壤

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3](567)}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使中国本来存在的社会矛盾更加错综复杂、激烈和尖锐。一方面，形成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而以民族斗争为主的复杂局面。另一方面，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又使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中国同其他国家的矛盾在不断发生重组。因此，在这个时期面临的异常特殊、异常复杂的诸种矛盾关系，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它客观地要求党和毛泽东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抗战的实际中。党和毛泽东以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正确地处理这些矛盾，积累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正是对这些丰富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的必然结果。

（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立具备了主体条件

以往革命的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党的领导机关中的一部分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要扭转这一局面，就需要有一个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坚强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的指示，从而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从组织上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加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原则在全党和共产国际得到认同的体现。这为毛泽东从全局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出科学的阐述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五）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思潮，为毛泽东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及内涵，是党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概括和提出的，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吸纳抗战时期进步思想界探索学术中国化有益成果，也是党和毛泽东提出并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不仅对中国进行武力侵略，而且在思想上进行奴化教育，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意志。这种状况引发知识界对本民族文化生存危机的担忧。强调中国特色，弘扬民族传统的“中国化”应运而生。以此为契机，“中国化”思潮代替曾流行一时的“全盘西化论”而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

“中国化”思潮发端于学术界。20世纪30年代初，吴文藻提出要使社会学“彻底中国化”^[8]，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中提出要“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术届明确提出“中国化”口号，并围绕什么是中国化、为什么要中国化，怎样中国化问题，展开激烈讨论。既要反对教条化、公式化，也要反对保守主义、复古和倒退，是当时学术届在“中国化”问题上的共识。这对毛泽东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及其展开阐述，是有一定影响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艾思奇等哲学工作者发起了一场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运动。在此基础上,1938年4月,艾思奇呼吁:“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9](307)}艾思奇、胡绳认为,要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除了要学习、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外,要注重中国传统哲学遗产,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

在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后,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内在根据、方法原则、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或通过正面阐述,或通过同错误思潮的批判,作了进一步的深入辨析和学理完善。这些研究和探索,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进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直接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

(六)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方式的改变及其适时解散,为毛泽东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曾有过正确的指导和帮助。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概括起来就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10](301)}。这是党内教条主义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会议决定“把活动重心移向世界工人运动基本政策和策略方针的制定,在解决所有问题时要从每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和特点出发,……避免直接干预各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事宜”。事实上,“自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以来,共产党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11](313)}。共产国际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通过默认或直接声明的方式予以支持,体现了其对中共内部事物的尊重。这就为中共根据本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地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进而创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思路、新方法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指出:“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1935年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12](424)}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转折点,从中共内部组织上、作风上为全党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准备了条件。而由于共产

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六届六中全会,则在外部为克服王明投降主义创造了组织条件,客观上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毛泽东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12](425)}1943年5月13日,共产国际提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既然各个国家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更其复杂,那么,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问题是会遇到不可克服障碍的。”据此建议,1943年6月9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

由于共产国际事实上已经是干预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和服务于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利益的工具,其解散有利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开展工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如毛泽东所言:“共产国际的解散……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从这中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的创造力。”^{[12](22)}摆脱羁绊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整风运动,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以其丰富的创造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胜利发展。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8] 吴文藻. 吴文藻自传[J]. 晋阳学刊,1982(6): 44-52.
- [9] 艾思奇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周恩来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12] 毛泽东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下转 371 页)